

著 瀾 文 范

漢奸創子手曾國藩

版 出 店 書 華 新 中 華

出版者的話

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和反對民主的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間有種種鬥爭，對於孫中山的了解是這種鬥爭之一，而在這一方面，關於會國藩的爭論可以說是一個特異的現象。孫中山先生是擁護洪秀全、反對會國藩的，他自稱爲洪秀全第二，痛罵會國藩輩的「以漢攻漢」的「行」動爲「廉恥道喪，莫此爲甚」；而現在中國的一切反動統治人物卻以祖先崇拜的虔誠來供奉會國藩，把會國藩著作大量翻印來作爲他們訓練幹部麻醉青年的教材，對於太平天國的宣傳則加以限制和禁止。譬如關於李秀成的戲劇即被禁演，並因此在四川綦江釀成過可驚的屠殺青年的血案。他們這種對於孫中山先生的公然的反叛，當然是他們整個地背叛革命三民主義的邏輯結果。太平天國是中國人民百年來轟轟烈烈的民族民主鬥爭的偉大旗幟，而會國藩則是百年來中國一切賣國賊反動派的祖師，這兩條路線的鬥爭至今還沒有完結，或者正因爲它快要完結了，所以會國藩的餘孽便不得不更加努力地拾出幽靈的木主來作絕望的掙扎。這種情況，不能不使我們對於會國藩的假面具加以揭穿，而范文瀾同志的這篇文章，就根據真實證據給我們解決了這個問題。因爲會國藩的衣鉢，過去既有它的傳統淵源，今天又有它的販夫走卒，讀者讀了這篇文章也就不但可以澈底弄清楚近代中國史的一場重大公案，而且可以得到理解古代和現代中國政治的一柄「鑰匙」。

一九四四年九月

目錄

一	辦團練 (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四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七
三	戰勝太平軍 (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四
四	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的各種 分裂表面化 (一八六四年——一八七二年)……………	一八

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

范文瀾

漢奸中央國權——軍機大臣，六部尚書，名義上滿漢平分，實際上主要權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權——各省督撫滿員常佔十之六七。總之，滿員掌握軍政大權。例如鴉片戰爭時，首席軍機大臣是阿林保，馮海各省直隸總督琦善，山東巡撫託渾布，兩江總督伊里布，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閩浙總督（駐福州）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林則徐、就中除林鄧二人，全是滿員。帶兵大員奕山、奕經、議和大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聩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及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會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會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的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漢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的滿族統治集團驚惶失措，束手無策。咸豐帝首先向程朱道學求救，令儒臣獻上朱熹大學講義，又編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四編講義。他親自到孔廟行禮、召集滿漢百官聽他講中庸致中和一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尚書四句（「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從這些講義看來，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無「德」「惠」了。但空談是無補的，他轉向奴才們攻擊，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爾等甘為大清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樣痛罵，還是無濟的。他再向士子們討好，斬舞弊生考柏後（滿族大學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場積弊極深，並不能「為士林維持風氣」。他灰心失望，索性懶管政

務，專玩女色，寵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閱奏章，嬖臣肅順替他找美女，同時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熱河發癆病死了。

會國藩就在這個時候，由於肅順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滿清統治者壓迫屠殺人民的急先鋒。那拉氏肅順二人是當時滿洲皇族裏最有「政治頭腦」的，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豐四年）會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豐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會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勳。」漢軍機師德藻獻媚道：會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豐帝被他提醒，臉色變了，半天轉不過氣來。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信任會國藩，專指望向榮（江南大營）、琦善、託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這些滿族將領的勝利，雖然他們的所謂大營也還是專靠張國樑一人支持。會國藩這時候還得掌握一部份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薦。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樑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會國藩為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後，那拉氏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會國藩兩江總督節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會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幾千萬人民的血泊之中。會國藩的這個「事業」使他成為百年來一切出賣民族的漢奸與屠殺人民的劊子手的開山祖。

會國藩是湖南湘鄉縣一個富農家的子弟，這一家人都有殺人的癖性。他和會國荃、會國華帶兵殺人。他的父親和四弟在家鄉依勢橫行，無惡不作，誰要是不合他的意，就被加上會黨的罪名，送到縣裏，數縣官立即執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監禁。縣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對自己不利，隔幾天總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說「會四爺又欲假我手殺人矣」。縣裏設立碼頭，照例殺豬祭神，會家父子以為

不够虔誠，殺了十六個人代豬，表示敬意。曾國藩在這一家人裏，尤爲特出，因爲不僅凶惡超人，而且還善於講道德仁義來掩蔽超人的凶惡。他在道光十八年他應科舉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從滿人倭仁湖南人唐鑑講習程朱道學，又被與乾隆時和珅並稱滿清二大奸相的另一道學老師穆彰阿認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別快。曾國藩既然一開始就是穆彰阿的私黨，又是號稱理學大師倭仁（官至首席大學士，爲西太后尊重）的講學後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衆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利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却不會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幾副面孔。曾國藩說「我平生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偽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動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真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爲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於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豐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機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麼？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闈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萬惡的滿清政府，除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漢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爲什麼必需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清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衆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

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會「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完全是合理的。可惜他們不懂得會國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領，只能暫時摧殘太平天國一類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拿到今天來破壞久經鍛鍊的中國人民的抗戰民主事業，就決無成功的可能了。

會國藩的活動與滿清這一時期的歷史是分不開的，從一八五二年（咸豐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為下列四個階段：（一）辦團練；（二）與太平軍相持；（三）戰勝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時反動派內部各種分裂表面化。

一 辦團練（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廣西永安時不超過一萬人（上帝會員，老兄弟），入湖南後，因湖南天地會員的加入，人數大增，首領衡山人洪大全，曾與洪秀全同稱萬歲。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死後，天地會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響本地會黨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這就給當地官紳辦團練來對付他們的機會。

團練一方面保護地主官紳的財產，一方面也使他們藉以魚肉鄉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暫時武裝，沒有出縣作戰的意圖，更說不到出省作戰。從保甲團練以至編成正式軍隊，轉戰全國這是由於當時滿洲反革命軍隊的腐敗無能，而一切反革命派——從滿清皇帝到各種大小漢奸——却都要求有一個反革命勁旅來和太平天國作戰所促成的。會國藩所以能夠進行這樣大規模的反革命活動，就正因為湖南當時是處在革命與反革命衝突的要衝；同時他與滿人關係親密，善講滿清統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學，有堅決反革命的決心和手腕，這幾個條件也幫助了他。咸豐二年，會國藩喪母在家，咸豐帝叫他

曾國藩辦團巡撫辦理本省團練，任務只是「搜查土匪」。次年正月，他到長沙辦事，首先區別了團與練。他所說的團就是保甲，選擇所謂「公正紳士」（事實上是最兇惡的紳士）當團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當時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練則是訓練鄉兵，集中縣城，隨時出動鎮壓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辦團，不重在辦練。凡是紳士族長來請辦團，就發給鄉團執照、族團執照，使有約束鄉、族，放手辦事的權力。辦練必須地方官主持，兵數不求多（約四五十人），更不求各縣都練。實際上却是授權反革命紳士普遍辦團，自己在省城募勇辦練，不讓地方官紳辦練斂錢，既免分他的兵權，又免引起人民新的反抗。他說他辦的是官勇不是團丁，足見他開始就有以官勇（臨時招募）代官兵（綠營兵）出省作戰的野心，不過形式上採取所謂保鄉自衛，藉以減輕，避免各方面的阻礙（如本省文武官的仇視、排斥、鄰省的求援，咸豐帝的嚴令出戰，新兵的不願離鄉土），並藉以實現他的訓練不完成、準備不充分，決不出省境的主張。

曾國藩辦團的方針是大張紳權，在省城設「發審局」，凡團紳送被捕人到局，立即殺死，禁止屍親呼冤，又禁止向團紳講理。他竭力提倡團紳捕人，地方官殺人，捕人要多，殺人要快，官殺人「不必拘守常例」，紳捕人「不必一一報官」。他那種瘋狂的屠殺，連巡撫司道等大官也看得太無人理，與他為難（主要是反對他越職侵權）；人民更陷入朝不保夕的險境，大家叫他「會剃頭」，形容他殺人像剃頭髮那樣多。他感覺到公論不容，給咸豐帝上了一個奏章，說「臣身雖得殘忍嚴酷之名，亦不敢辭。」（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自然，咸豐帝大加褒獎，鼓勵他「務期根株淨盡」，巡撫們也就不敢公然對立了。這樣，曾國藩成爲湖南強豪劣紳的首領，同時也得排除某些阻礙，進一步完成他的辦練計劃。

曾國藩辦練的方針是封建團結。練勇與將領全用湘鄉人（湘軍、湘勇由此得名），練勇招募落後的農民充當以便制馭。將領選取至親、密友，以及秀才、童生，這些人多是籍澤南（與曾國藩同學，

也講程朱道學)的學徒，平時講究所謂「忠誠」，聲稱願為保衛「聖道」「倫常」而死戰。事實上他們主要目的還是爲了求富貴，會國藩不願意羅澤南勢力獨盛，故用收門生的方式，羅氏學徒爭着拜會做氏老師。湘軍大將王珍(即王鑫)不服，說「我的老師只有羅山(澤南)一人」，大遭他的嫉忌，終被排去，其舊部後來即形成左宗棠系的湘軍。會國藩用同鄉、同學、親友、師生四種關係團結湘軍，造成私人軍隊，誰招募服從誰的作風，同時又奉他爲唯一的獨裁領袖。在左系湘軍成立以前，整個湘軍只服從會國藩一人，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各個營獨立，彼此不相統屬，除服從會國藩，不受其他任何人節制。近代軍閥軍隊從會國藩湘軍開始，李鴻章淮軍，袁世凱北洋軍等等軍閥軍隊一直繼承到現在。

太平軍佔領土地在長江沿岸，非水師不能決勝負。因此會國藩用更多的力量籌辦長江水師，大造船艦，尤其重視洋砲，要求咸豐帝向廣州購買千餘尊，裝備戰船，洋砲不到，決不出戰。他崇拜洋砲，贊美備至，認爲戰勝的決定因素。

咸豐四年二月，湘軍水陸兩軍組織完成，大舉出戰。陸軍五百人爲一大營，非湘鄉人營官所統鄉勇稱小營，附屬於湘軍各大營，陸軍凡十三營，五千餘人。水師戰船二百四十，坐船二百三十，凡十營五千人。官員、練勇、工匠、夫役水陸共一萬七千人。湘軍將士在思想上有以程朱道學作基本的封建主義的武裝，在軍事上有相當周密的準備，在湖南後方有豪紳地主的擁護，算是當時有力的反革命軍隊。

湘軍出境，會國藩請求咸豐帝發給他空白執照四千張，內指虛銜執照、捐監生執照各一半，派專人在湖南(湘軍根據地)、江西(湘軍進攻的目標)、四川(湘軍餉源之一)等省募捐。大規模開捐，籌餉是目的之一，主要還在讓那些缺乏社會地位的反動分子取得紳士資格，在本地辦團。他的主意是「以紳輔官，以民殺賊，佐兵力之不足」。(奏參江西巡撫陳啓邁摺)

會國藩反革命事業的主要依靠之一，是在善於爭取滿洲皇族的信任。他辦團設「發審局」，殺人如麻，負責局員二人，其一是滿人裕麟。他練鄉勇，遭綠營將領（多是滿人）猛烈反抗，甚至採用兵變方式，乃用色欽額總管業務，保舉塔齊布升任湘軍大將，二人都是滿人又都是綠營出身的軍官，使綠營反抗不成大害。後來出境作戰，總是上奏草，誇張塔齊布的忠勇和戰功，說他們「二人親如兄弟，合如膠漆」。塔齊布死後，特別尊崇多隆阿，會一度推他做統帥，指揮湘軍大將攻安徽陳玉成軍。會國藩力求取得滿族統治的信任，以便放手屠殺漢族人民，就在小事細節上，也避免引起猜忌。

二 與太平軍相持

（一八五四年——一八六一年）

咸豐四年二月，會國藩率水陸軍準備出戰首先頒佈一道叫做「討粵匪檄」的文字。這篇檄文，充分表現湘軍將領的封建性漢奸性，大意如下：

（一）「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江西、安徽、江蘇）被脅之人，會犬豕牛馬之不若。」針對太平軍老兄弟新兄弟的區分，挑撥內部分裂。

（二）「粵匪崇天主之教。謂田皆天主之田也，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日掃地蕩盡，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爲之所也。」針對太平軍之崇奉耶穌與宣傳原始共產主義，着重號召讀書人反對天主教，保衛孔孟聖道。這一號召不僅對當時的讀書人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也迎合了一部分當時還散佈在民間的守舊觀念。

（三）「粵匪焚州之學宮（孔廟），毀宣聖（孔子）之木主。所過州縣，先毀廟宇，闢帝岳王，毀佛道，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此又鬼神之所共憤。」針對士人尊孔思想人民迷信鬼神，挑撥聖教仇恨。

太平軍宣佈的民族大義，會國藩却一字不敢提到，只說幾句「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卹民，田不

加賦，戶不抽丁，連他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話。在宣傳上，太平軍在反滿清、反官僚、反地主方面，獲得廣大人民的擁護，湘軍在反對天主，保護孔孟方面也有若干影響。在軍事上，太平軍紀律嚴明，絕不騷擾，到處受人民歡迎；湘軍攻城奪地，盡量燒殺搶掠，將士得名得利，因此作戰也非常兇悍。在政治上，太平軍領土內一般人民安居樂業，生活比較改善；湘軍實際是曾國藩率領若干股賊匪，出省恣意殺掠，但他代表全國所有反動黑暗勢力，又以投降的主義方法緩和統治階級內部的滿漢矛盾，以及中國統治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矛盾，求得某種程度的反革命團結，基礎也還不弱。太平軍和湘軍在這條件下進行十二年戰鬥，相持階段佔了八年。最後太平軍失敗了，這却不是因為湘軍有什麼特別的本領，而是因太平軍一部分領袖的短見——他們一到南京就不圖進取，日趨驕慢，以至中途腐化分裂的結果。

太平軍到達南京，即採取保守主義。不乘勝以主力北上，發動北方民衆，直搗反革命的基本巢穴——北京（在當時是完全可能的），讓敵人得以從容重新調度力量，這是戰略上最大的失策，成爲後來失敗的張本。不僅如此，太平軍在下游不取上海、江、浙，滿清仍得享受漕米（北京滿人及官員的生命）、地丁、關稅、鴉片捐、外交權等利益，上游不發動、領導捻軍及其他起義軍，空耗兵力與滿清爭武漢三鎮，旋得旋失，終不能守，在這些方面，戰略上也已處失敗地位，湘軍作戰計劃，先取武漢，扼上游形勢，推胡林翼（也講程朱道學，與左宗棠同學）坐鎮調度。他的反動才能至少同曾國藩一樣，有時還要高些，湘軍後方鞏固了。第二步入江西攻取九江，第三步進安徽取安慶，最後取南京。曾國藩固守這個方針，即是在危急關頭，也死不放鬆（如在江西星子縣安徽與祁門縣。誓死不移營）。太平軍石達開攻江西，陳玉成攻安徽，李秀成攻江浙，總不能牽動他的主力（曾國藩部爲基幹）變換方向，甚至英法聯軍進攻北京，也不會動搖他的這個反革命戰略步驟。

正當湘軍出發的時候，太平軍攻入湖南，進軍長沙附近。曾國藩自率一部分水陸軍攻靖港，湘勇

潰散，曾國藩三次投水尋死，都被隨從人撈起。陸軍主力塔齊布，水軍主力楊載福，彭玉麟攻湘潭大勝，挽救了他的湘軍。他描寫這次戰功說：

「水勇開放大礮，專意射火焚船。是時北風甚勁，順風縱火，遇船即着，自卯至未，燒賊船六七百隻。長髮（老兄弟）短髮（新兄弟），逐浪飄流，紅巾黃巾（太平軍服裝），隨波上下，岸赭水溫，同歸浩劫，水戰火攻，未有痛快如此者。」（會奏湘潭靖港水陸勝負情形摺）

他把慘殺當作痛快，後來每次戰勝，總是用痛快的表情，繪聲繪色的寫出屠場慘景，然宛一幅一幅的地獄圖，向滿洲皇帝報功請賞，他的漢奸刽子手立場的堅決，真像頑石一般。

靖港湘潭戰後，太平軍退回岳州，曾國藩乘機重整水陸軍，裁去潰勇五千，補進羅澤南軍營。羅軍官全是羅門學徒，戰鬥力很強，陸軍有塔、羅，水軍有彭、楊，湘軍進一步堅強了。咸豐四年七月湘軍攻陷岳州，九月攻陷武昌漢陽，十二月進圍九江，完成了第一步作戰計劃。

曾國藩出境作戰。感到三個困難。

第一、太平軍作戰勇敢，「愈剿愈多，愈擊愈悍」，湘軍死傷極重，銳氣挫損，曾國藩乃提倡獸性來報仇洩忿，「振作士氣」。例如興國、大冶戰鬥，獲俘虜一百三十四名，「一概剜目凌遲」，九江城外獲俘虜十二人，立即「凌遲梟示」又生擒十三人，「就地挖目凌遲」，武昌城外太平軍新兵戰敗，「帶回七百餘人，全數斬決」。崇陽戰鬥擒獲七十餘人，殺死祭陣亡將士，祭畢，令兵勇割人肉生吞。在曾國藩獸性示範下，湘軍的殘忍是從古少有的。例如同治元年七月，湘軍攻破甯國府。「大呼直入，一律斬盡無遺」。過了兩個月，還是「城內外屍骸狼藉，無人收埋。」（請簡親信大臣會辦軍務片）賊匪遯湘軍的殘暴，野獸遯湘軍的貪婪。賊匪兼野獸，才是湘軍的真面貌。譚嗣同繪描這個真面貌說：「……湘軍以戮民為義，城邑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借搜緝捕匪為名，無分良莠皆膏之於鋒刃，乘勢淫擄焚掠，無所不至，捲東南數省之精髓，悉數入於湘軍，或至逾三四十年，無能恢復

其元氣，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仁學」卷下）事實上湘軍攻破一城，就是屠滅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謂「城破時，百物同歸於盡」，（批示徽州知府劉傳祺稟）就是全城生命財產，頓時化為烏有。

第二，人民擁護太平軍，敵視滿清。許多記載都說「民賊合一」、「民不恨賊而恨兵」賊如梳

（沒收富貴人財產），兵如篦（無所不取）。

會國藩自己也說：「自岳州至南京數千里，小

民蓄髮納貢，習為固然，雖經諭令薙髮，鄉民狐疑觀望。官軍稍有挫折，則四面皆賊，餉道易斷，（承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又說：「官兵有騷擾之名，賊匪有要結之術，百姓不甚怨賊，不甚懼賊，甘心從逆。官兵過境，無物可供買辦，無人可為嚮導。」（水師小勝並陳近日剿辦摺）「派出探兵，多被鄉民擒殺」（陳明隣省援兵協餉片、會國藩殉難三河鎮摺）。於是會國藩的獸性發洩到人民身

上，縱兵燒殺搶掠，殘留的人民，強迫薙髮，作為投順的標記。英人令利揚子江日記稱太平軍紀律嚴明，沿途破壞大多為清軍所為，責英國援助清軍為不義。容闈西學東漸記對太平軍「官軍」曾作公平的記載，他說：「人民對太平軍較有信用，商不輟業，農不輟耕，無荒涼景象。而太平軍對人民，亦未聞有虐待事，相處甚得。」又說：「運河（江南運河）兩旁之田，皆已荒蕪，草長盈尺，滿目蒿萊，絕不見稻稔麥穗，旅行過此者，設不知其中真象（指清軍燒殺破壞），必且以是歸咎於太平軍之殘暴，殊不知實由於官軍之殘暴，以予等沿途所見，太平軍對於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護，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治以極嚴重之軍法。」就是會國藩在同治二年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裏也承認太平軍「禁止姦淫，聽民耕種，民間耕種，公私各半，傍江人民安之若素」。南京攻卷以後，太平軍還是「民心未去」。（覆陳逆酋李秀成正法片）他為要取得勝利，乃大燒大殺，做到「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廢業」，使太平軍「行無民之境，猶魚游無水之池，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木之山」。（沿途察看軍情賊勢片）他見長髮人便殺，實際就是見人便殺，從前滿清入關，「留髮不留頭」，殺死中國人民無數，會國藩又大殺蓄髮人民，強令中國人民當滿洲貴族的奴役

。如果他還有絲毫漢人氣味的話，二百年前薙髮慘死，總不能無動於心的呵！

第三，湘軍是賊匪組織。目的在搶掠，搶飽了就叫「思颺」，就是說想逃散。咸豐四年，曾國藩對咸豐帝報告攻破武漢以後的情形說：「水師搶船太多，私匿藏貨，破城以後，水陸弁勇各獲財物，頗有飽則思颺之意。」（水師搜剿襄河續獲大勝摺）田家鎮戰鬥「各勇奪獲賊船至五百餘號之多，彭玉麟恐船隻太多，爭奪貽誤，又恐衆勇飽則思颺，遂將奪回之船，一并燒毀。」（官軍攻破田家鎮燒盡逆船摺）這還不是強盜爭贖的圖畫？這算是「抱道君子，赫然震怒以衛吾（孔、孟）道」？（討粵匪檄）曾國藩要鞏固軍隊，乃用一暗一明兩個辦法。暗的辦法是縱兵殃民。例如湘軍駐紮石埭城，紳士們同去向他訴苦說：「兵勇拆毀房屋，以作柴薪，捉夫歸民，爲伊搬運，所有店舖，被兵勇輩佔居買賣，更有夫役人等，借名砍伐竹木，而實攫取室中器物，城鄉內外，房屋完全者百無一二，如此橫行，以致歸民有官兵不如長毛之歎。」（石埭紳耆致在省諸紳書）這是平時駐軍的情況，戰時殺掠算作軍功，誰敢向他訴苦呢？他在事情無可掩蔽的時候，訓斥軍官一頓，表示維持「紀律」和「聲譽」。明的辦法是虛報戰功。憑他善於做文章，把湘軍寫得戰無不勝，一方面取得滿清皇帝的信任，一方面籠絡飽則思颺的軍心，湘軍保至三品以上的軍官，不下數萬人（陸軍借補小缺請飭部核議片），事實上湘軍幾乎全部是官軍。兵勇變軍官，小官變大官，使這些人貪利又貪官，升官無止境，貪利也無止境，繼續留在軍營裏當賊匪。也有整營的官和勇，搶飽了不願打仗，曾國藩只好全營解散，另招一羣「深山窮谷寒苦之民」來補充。湘軍始終依靠「貪」「殘」維持他的「戰鬥力」。

咸豐四年十二月湘軍圍九江，至八年四月陷九江，九年六月陷景德鎮，江西入湘軍手，前後凡四年半。中間經無數次大戰，陸軍主將塔齊布，羅澤南，（六年三月回救武昌時斃命）都被太平軍擊斃，水軍戰敗被分爲內湖（鄱陽湖）外江（長江）兩部，形勢常在危急中。曾國藩出死力保持通浙江的道路，從浙江方面獲得閩浙的餉銀、食鹽及上海的關稅，釐金、湘軍不斷潰敗，終得免於散滅

。太平軍不出兵取浙江，却在江西與湘軍苦戰，是極大的失策。石達開主持江西軍事，曾國藩最怕他，說他「狡悍爲諸賊之冠」。六年八月，洪、楊、韋內訌，石達開馳回南京，咸豐帝喜出意外，令曾國藩準備石達開來投降。曾國藩到底是老練的，他答覆咸豐帝，深怕石達開執朝政，說：「若其石逆勝而洪韋敗，則該逆挾詭詐以馭衆，假仁義以要民（結民心），方且飛揚自姿，未必遽有投誠之心。」（江西近日軍情據實覆奏摺）他又知道即使石敗也不會投降，說他會勸太平軍九江守將林啓容歸順，偽造文件騙瑞州守將賴裕新離防地，均無成效，還是切實備戰要緊。果然，石達開出南京後，率兵自江西攻浙江，曾國藩大恐慌，急令大將會國荃、李元度率湘軍主力攻石軍後路，大將李續賓（羅澤南部統將）出全力攻陷九江，石達開是孤軍，不得不退出浙江。

大平天國的內訌當然是此後太平軍失敗和曾國藩成功的一個決定原因，但太平軍後期的陳玉成李秀成兩個健將，並未使曾國藩得到順利的成功。咸豐九年十月曾國藩定四路攻安徽計劃，曾國藩會國荃任第一路攻安慶。太平軍安徽王將陳玉成驍勇善戰，聯絡捻軍，八年十月，三河鎮大戰。玉成擊斃李續賓會國華，羅澤南舊部全軍殲滅，曾國藩畏懼陳玉成，呼爲「四眼狗」，出全力對抗，才能支持。十年閏三月，李秀成陳玉成合攻江南大營，和春，張國樑敗死，大營潰散。秀成軍攻取蘇州，直入浙江境。滿清朝廷感到生命危險，發生前所未有的慌亂，第一次給曾國藩地方政權，叫他署兩江總督，帶兵親往援救，「保全東南大局」。江南大營（向榮自廣西尾隨太平軍到南京，駐兵孝陵衛，號江南大營）統帥一向是滿人（從向榮到和春），軍隊是綠營兵，駐地在南京附近。照咸豐帝的看法，滿州統帥與漢人曾國藩對立，綠營兵與鄉勇對立，湘軍在外圍戰勝太平軍，滿州統帥就近取南京居首功，可以保持滿州統治者的威信。大營潰散，咸豐帝的計劃失敗了，曾國藩取得兩江總督，表示湘軍勢力大進了一步。不過曾國藩並未應命赴援，他認爲安慶城圍一撤，全局敗壞，不可收拾，堅決不離關安徽。當時滿清的形勢確是異常危急，江浙迫於李秀成，鄂豫皖困於陳玉成，張洛行，江西又爲李

世賢黃金所攻入，這種局面，迫使曾國藩也不得不壓抑一下曾系湘軍獨佔戰功的思想，保薦左宗棠幫辦軍務，當自己的助手（實際是胡林翼保薦，咸豐帝重用左，分曾軍權），保薦沈葆楨（林則徐女婿，不滿意穆彰阿派的曾國藩）守江西，保薦李鴻章辦淮軍。他對李鴻章特別重視。說「該員勁氣內斂，才大心細」，挑選長江水師打仗得力的將弁，交李鴻章使用，從此出現了左系湘軍李系淮軍。

正在這時，又發生了一件震動全國的大事，使滿清的統治更見危急，也使曾國藩的毫無民族立場的漢奸本質更見發展。這就是英法聯軍之佔天津攻北京，直接威脅到清室與整個中國的生存。照常理說，這是滿清立國以來的空前巨變，忠於皇室，忠於聖道的曾國藩應該火速去抵抗了，但是事實却完全相反。曾國藩仍舊堅持他的軍事計劃，自己專攻安慶，江西交給左宗棠，準備從江西入浙江，對英法的侵略者方面則預定投降，喪辱悉所不計。他在奏覆勝保請飛召外援摺裏說，「俟該火就撫」，勝保的所謂外援自然是指湘軍，但這個外援這時却不是咸豐的外援，而是英法的內應了！形式上他是說要英法就咸豐之撫，但這顯然只是要咸豐就英法之撫的阿Q式的說法罷了！當時咸豐帝調湘軍上諭說：「情形萬分危急；……勿得藉詞延宕，坐視君國之急」；曾國藩却拒絕調兵，直截提出「撫」的辦法，他知道對英法侵略者接仗，只能喪失兵力，破壞反革命的內戰計劃，不如投降妥協較為便宜。滿清昏憤賣國，曾國藩精明賣國，他的才幹勝任反革命的內戰首魁，因之他也勝任賣國能手。

當英法反動派聯合的軍隊火燒圓明園，咸豐帝逃往熱河，清政府訂城下之盟北京條約的時候，曾國藩正在江西安徽埋頭作反革命的內戰，連打敗仗，中、英、法和議成功，法國、俄國的反動派要求出兵助攻太平軍，美國反動派要求從海道運漕米到天津，曾國藩贊成「目前資夷力以助剿濟運，得紓一時之憂」。法國剛把他的「皇上」驅逐出北京，還不會回來，也要「獎而允之，許其來助」以反對太平天國（覆陳洋人助剿及採米運津摺），他的頭腦裏，確是除了反對革命的人民以外，再沒有別的思想。北京條約後，英法與滿清的勾結進了一步。咸豐十一年九月，幫助滿清的英人赫德（管理中國

海關）建議進口鴉片每箱加課新稅，用稅款買外國小火輪及槍炮，法國也顯出賣槍炮並派人傳授製造法，咸豐帝很滿意，徵詢會國藩意見。會國藩完全贊成，認為「我皇上聖慮周詳，安內攘外（！）之至意」。（覆陳購買外洋船炮摺）他要求咸豐帝在訂購洋船未到前，馬上先撥給兩隻從美國租來的破舊船使用。在利用外國人力物力以屠殺人民時，會國藩就全然不管什麼中國文明與外國文明的界限了，相反地，把外國侵略者當做親老子，把本國人民當做唯一的仇敵，假安內攘外之名，行安外攘內之實，假尊孔復古之名，行亡國滅種之實，這正是會國藩傳給後來統治階級的「不朽」衣鉢。

會國藩堅決圍攻安慶，十一年八月終於被他攻破，屠殺城中太平軍二萬餘人（老弱婦女在外）。跳水圖逃的又被水師截殺，「實無一人得脫」。他自稱大快「人」（獸）心，向咸豐帝報功，不料這個滿洲主子七月裏因貪色過度死去了。他接到消息，哭得「伏地慟絕」，說是不得趁主子活着的時候博他一笑。

三 戰勝太平軍（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

咸豐帝死去，西太后那拉氏當權，她知道要滅太平軍必須依仗會國藩，而會國藩的漢奸忠實性又確信可以保險，立即大胆給他兩江總督節制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的大權（十一年十月）。他獲得漢員空前未有的信任和權力，在這一時期中，高度發揮了他的反革命才能，尤其在對外關係上，他善於把封建勢力與外國侵略勢力相配合，依賴外國來取得反革命內戰的勝利。

上海是外國侵略中國的根據地，李秀成軍取江浙，官僚豪紳地主富商多逃奔上海，上海成爲反動份子的集中點。咸豐十年，上海反動份子組織「愛國會」，出資僱美國的一個在本國犯罪逃亡到上海的流氓華爾成立「常勝軍」，與太平軍作戰。會國藩從「人民如海，貨物如山」，「關稅每年數百萬兩」一點看，上海是最大的「餉源」，從取得洋船洋炮洋兵「助剿髮逆」一點看，上海是求外國改革